

# 晋侯墓地研究述评<sup>[1]</sup>

## (下)

□ 谢尧亭

### 三、晋侯墓地的器用制度

#### 1. 青铜器、玉器、瓷器、陶器等器物及组合研究

李学勤介绍了一件古越阁收藏的晋公戈,认为是公元前 837 年晋釐侯物<sup>[123]</sup>。朱启新报道了上海博物馆购回的晋鼎<sup>[124]</sup>。李学勤认为北赵晋国墓地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标尺<sup>[125]</sup>。赵世刚认为晋公戈的年代当定为晋献公四年较为合适<sup>[126]</sup>。周亚介绍了上海博物馆收购回的晋侯墓地铜器,包括晋侯对青铜器六件、盗自 M 8 的鼎、簋各 1 件、晋伯甗 1 件,并对其名称等予以讨论,认为 M 8 晋侯苏鼎至少应有 5 件,铜簋上的晋侯名字以李朝远隶释为是,推测晋伯甗器主与晋侯邦父、晋叔家父的关系存在三种可能<sup>[127]</sup>。孙华认为晋公戈是春秋早期之物,以晋武公的可能性最大<sup>[128]</sup>。张德光认为晋与列国青铜文化的交流始自西周晚期,且数量有限,交流的形式为战争、贸易和友好往来,在器形、纹饰、铸造工艺和错金技术等方面有所交流<sup>[129]</sup>。陈芳妹认为晋侯“对”(本文作者拟隶,陈氏为器铭原文)铺为西周中期偏晚器,其用以盛放熬煎过的肥美的米,出土于高级贵族墓葬,表明稻粱的加入黍稷,使得此前由盛放黍稷的簋独撑粱盛器大局之势改变了,说明了西周中期以后青铜粱盛礼制的繁复化及祭仪中对高举或手执青铜粱盛器的需求<sup>[130]</sup>。蔡鸿江研究了晋系青铜器的形制特征、纹饰特征、铭文字体特征及其编年、三晋青铜兵器铸造制度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认为晋系青铜器形制分为八类,纹饰分为五类<sup>[131]</sup>。刘克甫认为西周青铜容器之基本特色,其一律为礼器,非普通实用器具,西周随葬的铜器,除墓主自作器以外,另有三种来源:祖考所传递者、上级所赏赐者、父母所作媵器,认为有不同作器者之铜器出于同一墓葬时,其中辈分或等级最低者,才为该墓墓主,同墓所出铜器之不同作器者或受赏者中,如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则

墓主应为女性,即西周时代地位较低者之器不会随葬于地位较高者之墓,即便是同等地位人的馈赠也不可能埋入墓葬<sup>[132]</sup>。唐友波认为“晋叔家父”即殇叔是可信的,并讨论了叔氏、杨姑、柏姑等人物的姓氏问题,认为叔氏是以行字叔为氏,休之“文考叔氏”与“叔钊父”、“晋叔家父”及晋穆侯均为兄弟行,柏姑是嫁到晋国来的柏国姑姓女子,杨姑也应相同,这种称法不仅是他人称之,也是自称<sup>[133]</sup>。商彤流认为 M 113 出土的青铜双耳罐与辛店—刘家文化中常见的陶双耳罐相似,推测晋国的所在地域为戎狄之地,而后被周人所灭,这件青铜双耳罐反映了先周晚期、西周早期晋国地域内的羌戎文化因素<sup>[134]</sup>。汪涛认为西周后期的青铜艺术显示出衰落的气象,同时,新的苗头也开始出现,两周之际的晋国青铜器,不但在器形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在工艺上也有所改进,可以说是代表了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青铜器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对一些特殊器物的考察,为研究“性属”问题提供了信息,加深了我们对古代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认识,认为晋国的青铜铸造工艺跟周王室铜器大体一致,但仍有自己的特点,除了模仿陶器和玉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生产似乎也受到木器工艺的影响,青铜器上用人形来做装饰似乎是晋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认为妇女在西周时代的晋国地位并不低,她们在社会上以及礼仪祭祀活动中扮演了与众不同的角色<sup>[135]</sup>。苏芳淑、李零介绍了在香港见到的一件有铭青铜跪坐人像,刻铭 21 字,记载晋侯与淮夷激战,擒获淮夷君王,颂扬周王,铜人像或许就是当时淮夷君王的形象。作者认为这件晋侯铜人或者可以和 1992 年间在香港出现的晋侯苏钟作联想考虑<sup>[136]</sup>。李学勤认为晋侯铜人腰带前方的蔽膝,当即戎服的韍,铜人铭文中的晋侯当为厉侯或靖侯,更倾向于前者<sup>[137]</sup>。孙永和、吉琨璋介绍了曲沃县博物馆藏的晋侯墓地盗出的青铜礼器、车马器和石磬等<sup>[138]</sup>。李朝远认为晋侯墓地所出青铜器共 400 余件,出现了一

些前所未见的器形,如鸟尊、猪尊、兔尊、立鸟人足筒形器、兽面纹铙等,晋国礼器呈现出重食和重乐的特点。鼎、簋、甗的组合与西周其他地区鼎、簋、鬲的核心组合不同,晋侯墓地的鼎簋组合几无整齐划一的规律可循,水器组合的特点是盘匜组合与盘盂组合同时共存,且晋侯墓多用盘匜组合,夫人墓多用盘盂组合。盪盞花一现,簠仅一见,未见酒器觚,对酒器鸟兽尊和壶情有独钟,随葬青铜明器特点鲜明,青铜器纹饰特点是繁缛与简朴并行,立体装饰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sup>[39]</sup>。宋房由美子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整体上虽然吸收了岐周、宗周、近畿青铜容器的器形和装饰手法,但与任何时期都不完全相同,有着相当明确的独特性,在西周末年更是形成了独特无双的固有设计,也成为春秋时期装饰手法的先驱及重要的发祥地<sup>[40]</sup>。陈芳妹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铜三足瓮与铜双耳罐只见于女性墓中,并与北方民族的陶器相似,有可能反映姬晋殖民政权对本地文化的冲击。女性墓中铜制模仿陶器型则是通婚后的影响,墓地中所出土的一些罕见青铜新器制,如方座筒形器与人形足攀龙盒,也只见于女性墓中<sup>[41]</sup>。周亚认为晋侯墓地中这些数代晋侯的铜器或者兄弟铜器合葬的现象,也可能是赠赙制度的表现<sup>[42]</sup>。李晓峰对晋侯墓地发表的81件有铭青铜器铭文进行了集释,集释之后以按语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认识<sup>[43]</sup>。杨颖亮认为晋侯墓地青铜器合金类型主要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全部为铸造成形。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成熟,知道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进行合金配料且配料几乎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周代的人们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而且充分认识了铅在青铜配料中的作用。晋侯墓地在随葬青铜器时,不区分实用器和非实用器。乐器退火为了改善音质。铸造组织中,富锡相比较容易腐蚀,单一的 $\alpha$ 相则比较耐腐蚀。自由铜的出现和锡铅的腐蚀都有关系,完全矿化的组织,锈蚀呈层状分布,一层孔雀石,一层红铜矿。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属于普通铅。侯墓和邦墓随葬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都分布在A、B、C三个区域中。西周时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在分布区域上有共同特征,基本都分为A、B、C三个区域<sup>[44]</sup>。陈剑认为M113 68猪尊铭文末一字当读为“彝”,甚或就是彝器之彝的异体<sup>[45]</sup>。角道亮介认为北赵墓地青铜鼎与天马一曲村遗址青铜鼎存在着同样的变化倾向,这与西周王朝中心地带的青铜鼎呈现着相同的模式,

从中可以看出晋国刻意地维持着与西周的友好关系,北赵墓地是晋侯及其宗室在西周时代的一定短时期内建造的墓地<sup>[46]</sup>。

李学勤将文王玉环上的文字释为“文王卜曰:我及唐人大战贾人”。认为这件玉环乃是晋国初封位置的重要证据,唐、贾二国皆在晋南。文王生前称西伯,文王是谥称。环上文字刻于西周初年,或即唐人所刻<sup>[47]</sup>。孙华认为M1为5鼎4簋,M2为3鼎4簋,它们与该墓地其他晋侯墓一样,其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之制,规格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因为晋为甸服偏侯,这正是晋侯恪守周人礼法的反映。周人饰棺制度的形成很可能在西周中期后段,即懿、孝之际以后,M2有缀玉覆面,缀玉覆面的出现时间很可能在懿、孝之际前后,并在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敛具。M1出土的三角形锋中胡戈是目前所知年代明确的最早一例<sup>[48]</sup>。孙庆伟讨论了珩与璜、衡与牙等,认为两周佩玉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可视为璜、珩的发展变化<sup>[49]</sup>。孙华认为M8可能为一椁二棺,M31应为一椁二棺,M8、M31组墓的棺饰为两池,两墓饰棺翼数皆为四件,相当于周礼大夫用翼之数,M8为5鼎4簋,M31为3鼎2簋,晋国时为甸服偏侯,其使用大夫的礼器规格与其饰棺制度相吻合,并讨论了M8、M31组晋侯夫妇在用玉制度上的异同和特点<sup>[50]</sup>。孙机认为组玉佩既有礼玉的性质,又有引人注目的装饰功能,墓葬中的组玉佩大多数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笼统地归入葬玉范畴不确,身份愈高,组玉佩愈复杂愈长,反之亦然,它与步态有关,组玉佩的功能性作用是节步,礼仪性意义是表示身份,认为文献中的黄即璜、即衡、即珩,黄为命服中的玉佩,先秦时,珩和璜区别并不严格,西周并无髀形之珩,东周以降,组玉佩的形制产生较大变化<sup>[51]</sup>。赵化成认为商代棺椁多重制度尚未出现,西周至春秋早期,棺椁多重等级制度尚未形成,与商代相比,贵族使用重棺的现象已较普遍。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棺椁多重制度已经形成,战国中晚期为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僭越和破坏期。西汉时期为其损益和衰亡期。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形成要晚于用鼎制度<sup>[52]</sup>。曹玮认为晋侯墓对墓室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地位或爵位与墓室面积的大小有着直接的联系,相比之下,晋侯夫人墓的墓室却不是那么严格,车马在两周时期是爵位高下的象征之一,殉车马是丧葬制度中表现等级的内容之一,祭祀坑的多少应该是男女有别的,祭祀坑上的男女差别应该来自礼制的限制,夫人

们的墓里则没有殉狗的现象,乐器和金属兵器、工具只出土于晋侯墓,晋侯夫人墓中有出土玉戈的现象,晋侯墓以5鼎4簋为主,夫人墓以3鼎2簋或4簋为主,酒器在随葬品中有一个从实用器向明器过渡的过程,以列鼎列簋为中心的器物组合在西周穆王前后出现,但形成制度当是西周后期的事了,这一点在晋侯墓里表现得更为突出。晋侯晋侯夫人在随葬制度上存在差别,体现在鼎簋数量,编钟有无,鬲的有无、兵器、工具的有无,方壶、圆壶的差异,玉器数量等方面,墓主生前用器,“拼凑”成礼制规定的器用配置,即随葬于墓中<sup>[153]</sup>。印群认为西周时期出现列鼎但并不成熟,春秋时期列鼎制度成熟并得以发展,战国中期列鼎制的实际作用基本丧失。认为“春秋礼制崩坏说”值得商榷<sup>[154]</sup>。宋玲平认为晋侯墓地的动物玉雕分动物造型玉器和动物纹饰玉器两类,前者分四类,以塑造写实动物为主,神话动物为辅,采用圆雕、片雕手法。后者分写实动物和神话动物两类,以前者占绝大多数,后者罕见,采用浅浮雕和少量透雕手法。总的来看,写实风格为其主流<sup>[155]</sup>。李伯谦认为M62墓主是晋穆侯的正夫人,M63是次夫人,从M63玉器装入铜盒内随葬认为西周晚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本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世俗的对美的追求也渐渐萌生,专供观赏把玩的完好玉器的出现和对它的可以收藏,则可作为从西周晚期开始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出现变化这一现象的一个反映<sup>[156]</sup>。曹楠认为晋侯墓地的葬玉有玉覆面、玉琰、玉握、踏玉,西周时期的葬玉在北赵晋侯墓地得到普遍的使用,以M8最为典型,从M8的葬玉可推断,虽然完善的玉衣到西汉中期才出现,但是西周晚期玉衣的雏形已经形成。西周存在的玉能防腐的观念和葬玉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葬玉的使用进入鼎盛时期<sup>[157]</sup>。张尉认为晋侯墓地玉器从功能上可分为礼器、佩饰器、丧葬器等,形制有几何形、象器形、象生形等,玉器装饰手法多样,既有写实性,又有几何性,阴刻、浮雕、透雕、圆雕等等手法运用自如,玉料既有新疆和田玉,也应有地方玉,晋侯墓地玉器在形制、纹饰、琢工上较商代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sup>[158]</sup>。孙庆伟比较系统地收集并研究了周代墓葬出土的玉器及其制度,其中对晋侯墓地的玉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sup>[159]</sup>。孟耀虎、任志录认为晋侯墓地出土的原始瓷器全部为手制轮修,容器可能采用泥条盘筑,容器采用刷釉法,豆类器物采用

蘸釉法,器形为接制,青瓷来自南方,以产于浙江的可能性较大<sup>[160]</sup>。朱凤翰认为晋侯墓地M9出土的7件铜鼎已属“列鼎”<sup>[161]</sup>。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晋侯使用5鼎4簋(或6簋),晋侯夫人使用3鼎2簋(或4簋),严格的列鼎列簋制度在西周早中期的晋国尚未形成,不过从整体观察,至西周晚期用鼎制度当已基本确定,并强调了西周晚期人们的用玉观念已开始发生了变化<sup>[162]</sup>。张懋镠认为晋侯墓地出土方鼎再次证明在西周早期方鼎一般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方座簋是规格较高的青铜礼器,它出现在墓葬中,有助于提升食器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铜盃的发明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体现,也反映出姬周贵族在使用新型礼器方面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所谓天子9鼎8簋等记载只是复杂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制度被多次过滤后留存下来的残骸。晋侯墓地的鼎簋数目,似乎早期多而晚期少。晋侯墓器物组合是食酒水乐器,夫人墓无乐器,而酒器普遍存在,只是夫人墓酒器种类较少,晋侯墓地的器物组合关系比较稳定,礼制没有多大变化。觚、斝、方彝在晋侯墓地的多次出土表明殷商礼制在西周高层贵族阶级中积淀得更多一些,显示出晋国诸侯保守落后的一面<sup>[163]</sup>。宋建认为晋侯墓地实行列鼎形式最早的是晋侯对墓(M1),西周中期情况比较复杂,西周晚期除个别特殊者,几乎都是列鼎形式,曲村北墓葬表明,用鼎形式的规范完善似乎是从列簋开始的,虢国比起晋国和应国来都要礼高一等<sup>[164]</sup>。陈芳妹认为在晋侯墓地的时代,同一器主的青铜器在随葬时,不以一器主为限,而是被用来表达了世代及夫妻间的关系网<sup>[165]</sup>。徐伯鸿认为晋侯墓葬用五鼎四簋之制,为五命级,乃赐则小侯,晋为五命赐则小侯,晋侯礼仪以五为节,其器用五鼎四簋之制。晋侯夫人的命数为三命级。西周穆王前多鼎指以用牲的多寡规格来标示墓主的地位,穆王以后以用鼎的多寡来表示墓主的命级。自殷商时期至穆王时期的用鼎制度的变化过程正是一个血缘关系逐步受到阶级关系干预,全部亲属关系政治化的过程。晋侯墓地的墓葬用鼎制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即使用一套方鼎和两套圆鼎的多鼎制的用鼎制度,第二种类型即鼎簋相配的所谓“规范”的用鼎制度,它反映了穆王晚期建立起来的命级制度,第三种类型即以一组鼎簋标示墓主依周王礼制享有的命级,而以鼎簋的总数标示僭用的爵等,这种用鼎制度反映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僭制越等与尊王攘夷、保守周制这对矛盾的斗争与消

长的过程<sup>[166]</sup>。

雍颖认为,晋侯墓地最早的两座晋侯夫人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明显多于其他夫人墓,严格意义上的列鼎列簋制直至西周晚期的 M 8、M 31 组墓才完全确立,铜编钟和石磬只见于晋侯墓,而见于晋侯夫人墓,一些小件青铜工具也见于晋侯夫人墓中,因此小件工具不能作为判断墓主性别的标准,玉钺只见于晋侯墓,玉蚕只见于晋侯夫人墓中,玉琮的使用并不只限于男性,晋侯夫人墓中的殉车、祭祀坑和青铜礼器明显少于晋侯墓。玉器成为晋国贵族妇女身份地位和财富的标志<sup>[167]</sup>。张奎认为按照周礼晋侯邦父应是七鼎待遇,实属五鼎,可能反映了当时礼制已破坏,有可能表明本来就不存在这种制度<sup>[168]</sup>。王世民认为在西周时期,金石之乐似为周王卿士和列国诸侯方能享用的高级规格,由晋侯墓地的编钟探讨了西周成组编钟的发展过程,指出能使用两组编钟和一二组编磬的墓葬,应属于礼制上更高的规格<sup>[169]</sup>。李朝远认为侯墓中可以作为组合的鼎数有减少的趋势,夫人墓中亦然,侯墓中鼎制的规范化可能初始于 M 1、M 2 组时,鼎的组合和用鼎制度经过了西周早中期的发展和磨合,到 M 8、M 31 组时方基本确立晋侯五鼎、夫人三鼎的鼎制,晋侯墓地用鼎制度的演进,可以视为周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M 92 和 M 1、M 2 组发现的晋侯“对”鼎分别铸造于宣王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sup>[170]</sup>。周亚在收集和研究了部分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列鼎数据之后,认为晋侯苏鼎有可能是七件一套的列鼎<sup>[171]</sup>。张崇宁认为肖形器的风格写实完全是出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设计,不同于大多青铜器的设计是由用途和用料为出发点,也许因为这种写实风格不如抽象的动物纹饰能表达统治者的威慑力、权力,所以无法受其大力支持,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主流<sup>[172]</sup>。马今洪认为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鸟尊、猪尊、兔尊在形制方面既有鸟兽形尊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创新,在西周晚期晚段,兔尊替代了尊的功能,形成新的酒器组合,而猪尊、兔尊的火纹显示了晋侯墓地青铜器的独特性,晋侯墓地尊在使用年限上的大大延迟,可能是晋侯墓地青铜器的一个特点<sup>[173]</sup>。陶正刚认为晋国继承了周王朝的礼俗对鸟的崇拜,在晋立国后,始终不渝地把鸟视为神祖,鸟人图像是晋国崇拜的神祖像,也是祈求他来保护和佑助同族人、团结同族人崇拜的对象<sup>[174]</sup>。杨晓能认为青铜礼器外底图像既是史前跨地区、跨文化的远祖动物崇拜的遗存,又是

一种介于铭文和装饰之间的新媒体,可命名为“图像铭文”或“动物图像铭文”。三代时期众多民族、氏族、家族共同崇拜的有关动物或动物群,晋国相互吸收、融合和标准化的进程,已达到综合化、概念化和普及化的程度,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区别各个氏族崇拜的动物的些微差异<sup>[175]</sup>。宋玲平认为酒器多出自晋侯墓,晋侯夫人墓较少,早期墓酒器所占比重大,晚期墓水器增多,酒器、车马器、漆器的有无似乎也代表一定的等级意义,只有晋侯墓才出编钟编磬,始终随葬车马器,一般都出玉覆面,随葬原始瓷。关于鼎簋相配制度,西周晚期早段以前,晋侯诸墓似乎没有特别的规律,从西周晚期晚段 M 64 组开始比较规范。自 M 33 开始,晋侯墓均出编磬,编钟与编磬伴出,夫人墓不见,男性墓殉车或狗,女性墓不见,兵器、工具一般出自晋侯墓,罕见或不见于夫人墓,男性墓均随葬甗,女性墓罕见或不见。晋侯墓的车马器较夫人墓的多,夫人墓陶器多于晋侯墓,大口尊和三足瓮仅见于夫人墓。女性墓随葬玉器数量往往多于男性墓,在随葬器用制度上,女性墓的规格通常低于男性墓,棺槨多重制度在晋国西周中期早段一度出现,犹如昙花一现,到西周晚期才逐渐形成基本规范的制度,一椁二棺是当时封国国君享用葬具的最高规格<sup>[176]</sup>。

## 2. 两套钟的研究(晋侯苏钟、楚公逆钟)。

朱启新<sup>[177]</sup>、卢连成认为晋侯苏钟是宣王时铸造的<sup>[178]</sup>。王占奎认为 M 8 为晋献侯墓,晋侯苏钟只能是宣王世,苏钟的三十三年是指共和以来的宣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 809 年<sup>[179]</sup>。王恩田认为苏钟的三十三年是周宣王三十三年,东征的对象是鲁国的伯御,晋侯苏的卒年订在三十二年及其以后,晋献侯在位二十七年以上,晋穆侯在位不得超过 11 年<sup>[180]</sup>。马承源认为刻凿晋侯苏编钟铭文的有尖锐锋刃的利器,只能是铁制的,纪年考定为厉王三十三年《史记·晋世家》所载西周晋国年次之数并不可靠,以此推算的晋侯墓地的布局和昭穆系列,恐怕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安排。进而认为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考证夙夷即宿夷,宿的地望在山东东平县境,郛城地望在今郛城之东<sup>[181]</sup>。王占奎认为月相说其实是一个有待证实的假说,初吉等四个术语可能是一套不以阴阳历为其体系的记时术语,它们是以十月太阳历为其历法体系的时段术语,晋侯苏钟铭之三十三年是共和以来的三十三年(前 809 年),主张宣王凡六十年(前 841—前 782 年),厉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前 878—前 842 年),懿王元年即公元

前 899 年, 恭王在位至少 15 年, 穆王 55 年, 昭王在位 19 年, 成康之间不少于 40 年, 康王似不少于 25 年。据统计 85% 以上的铜器铭文合乎通例, 在当时天文知识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此种例外不足为奇<sup>[182]</sup>。李学勤认为苏钟部分为南方地区产品, 钟铭历日合周厉王三十三年, 即公元前 846 年, 郛城在今山东郛城东十六里, 这一军事战场在古大野泽北, 梁山一带。钟铭的晋侯苏系即位后追称<sup>[183]</sup>。王占奎认为如果不拘泥于“月相说”, 苏钟之三十三年也可以是共和以来的第三十三年, 定点月相说不能成立, 四分月相说也并未因苏钟的发现而前进多少<sup>[184]</sup>。李伯谦认为苏钟为宣王三十三年<sup>[185]</sup>。刘启益认为钟铭晋侯苏是晋穆侯弗生, 晋侯苏钟是宣王时铜器, 定点说核查的月相完全相合<sup>[186]</sup>。王世民同意厉王说, 所记是目前所知西周晚期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sup>[187]</sup>。李学勤同意千亩之战与晋无涉说, 认为殇叔纪年应单列, 共和要单独计算, 不能与宣王合并<sup>[188]</sup>。陈久金认为晋侯苏钟有音节顺序为凭, 可暂时确信其为同一年的月日干支, 指出人们对西周时是否使用子正, 一直持有怀疑态度, 认为马承源所说的厉王三十三年不是苏钟记事之年, 宣王三十三年为前 794 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不同意钟铭干支刻写颠倒的说法<sup>[189]</sup>。张闻玉认为司马迁《史记》纪年不误, 月相非定点不可, 钟铭应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部分, 前记穆王事, 后记晋侯苏随宣王征战, 钟铭前段历日有误刻<sup>[190]</sup>。张培瑜认为第二或第三个纪日干支有误, 月相不定点, 可能四分月相说更为近真<sup>[191]</sup>。高至喜认为这套编钟不是在晋地铸造的, 而是来自江南<sup>[192]</sup>。裘锡圭认为钟铭似乎不大可能原原本本地去追记二十余年前之事, 并按追记时器主的身份去改变他在当时的称呼。共和年数古今无异说, 同意初干吉日说, 认为王占奎说比较合理, 倾向宣王说, 并释铭文“分行”前一字为“范”字<sup>[193]</sup>。黄锡全认为“左汭”后一字为“顾”地, 在今山东鄆城县东北, 旧治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 汭地推定为高鱼, “列”即犁(黎)地<sup>[194]</sup>。冯时认为西周金文记述同月之事, 月相往往只记于首见之日, 而同月其他日期则不复记月相, 初吉与月相两类语辞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钟铭两二月“实际并非记录同年同月之事”, 自周王三十三年开始的省疆土活动与其后的征伐宿夷战事, 其实反映的只是同一事件的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献侯卒年与穆侯即位的时间被限定在宣王三十五年及三十六年两年之间, 西周吉日系统是独立于记时系

统之外的忌宜系统, 并行不悖, 四分月相说并非西周历法的实际内容<sup>[195]</sup>。孙华将王三十三年定为厉王三十三年<sup>[196]</sup>。黄彰健认为既死霸即朔, 指初一(既吉、初吉), 哉生霸为月光初生, 生霸为望, 既生霸为既望, 方生霸为月光初缺, 死霸为晦。晋侯苏钟为周宣王时器, 其月相铭文错误太多, 钟铭三十三年可能系三十一年之误<sup>[197]</sup>。谢尧亭认为把“苏”定为晋献侯以外的任何一位晋侯都是不可取的, 苏钟以宣王说为长, 并指出西周历法仍然只是在探讨阶段, 不应以历谱来简单地修正钟铭<sup>[198]</sup>。黄盛璋认为夙夷国都就是熏城, 并非鲁之郛城, 宿国可上追到殷代, “方生霸”、“方死霸”实为使用两个弦月相授时而为两个独立月相纪时词, 陈久金所提公元前 794 年较为合理, 史公所推年纪, 已确证有误, 钟铭“癸卯”为“癸巳”误刻, 西周以朏为月首, 而不是朔, 既生霸、既死霸分别为 9 日与 24 日, 月相纪时词表时点和时段不能两兼<sup>[199]</sup>。周书灿认为晋侯苏钟纪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 主战场似亦当在西周王朝的东南一带, 即江汉、江淮一带, 编钟所记作战地点自然很有可能即在江南一带<sup>[200]</sup>。王子初指出, 式钟的形制结构对中国青铜钟类乐器发展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关键特征在于其有旋而无斡, 说明其并未按吊挂演奏的方式设计, 其年代至少应在西周初期, 16 件晋侯苏编钟并非同一时期的产品, 它们很可能是在自西周初期至恭王世前后 200—300 年间逐步发展增扩形成的。这套钟可以分为音列相同的 2 组, 编钟的音准情况是比较差的<sup>[201]</sup>。方述鑫认为晋侯苏钟纪年以宣王说为是, 三十三年属于宣王即位三十三年, 即传统算法的宣王十九年(前 809 年), 一月四分月相说可信, 《史记》关于晋献侯苏在位为宣王时代的记载是可靠的<sup>[202]</sup>。李朝远认为晋侯苏钟为西周厉王时器, 晋侯苏钟铭文是由陨铁刻制的<sup>[203]</sup>。常金仓认为西周史官记时有个通则, 就是于一月之中只用一个月相, 我们还不能将“癸卯”与“壬寅”倒置而简单了事, 并认为古代月相无四分之说<sup>[204]</sup>。张闻玉认为王三十三年指穆王三十三年, “分行”二字以后刻凿晋献侯随宣王征伐的战功, “二月既望癸卯”确实是刻工的误刻, 晋侯苏钟与厉王无涉<sup>[205]</sup>。仇士华、张长寿认为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 赞同李学勤的晋侯苏即位后追记此前跟随厉王东征的说法<sup>[206]</sup>。《纪要》认为周正建子与建丑游移说得到大多数学者赞同, 大多数学者认为月相四分说或近似的说法可以采用, 月相定点说难以成立, 对初吉是否月相分歧较

大,初吉表某月上旬中任何一日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初吉和月相不是一个系统,霸指月的光面。张闻玉坚持月相定点说,刘启益认为初吉为月出这天,既生霸为月出次日,既望为月圆的次日,既死霸即晦,黄盛璋主张月相六分说。M8木炭碳14测年校正为公元前 $808 \pm 8$ 年。共和元年(前841年)这个支点不宜轻易变动,将懿王元年“天再旦”为公元前899年说也作为排谱时的一个支点<sup>[207]</sup>。黄盛璋认为M8的碳14测年结果完全否定M8为厉王三十三年(前846年),但不能排除M8晋侯苏可以到宣王三十三年,苏钟按铜器学研究王世必为宣王,绝对不是厉王,钟铭“癸卯”应为“癸巳”误刻,公元前794年较合王三十三年苏钟历日M8为晋献侯墓<sup>[208]</sup>。李仲操认为西周月相是定点的,晋侯苏钟所记东国南国实指今山东省南部济宁地区的古代小方国,夙夷所居之地应在今山东省南部,济宁与胶东交界之处,认为钟铭癸卯为癸巳之误,三十三年为晋侯苏即位之前的厉王三十三年<sup>[209]</sup>。成家徽郎认为李学勤说是大有可能的,同意冯时的二月不同年的解说,导入火历,认为周厉王在位实际是38年,厉王元年当为公元前879年,苏钟的“王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847年<sup>[210]</sup>。李仲操认为“癸卯”应“癸巳”的误刻,支持月相定点说,钟铭三十三年为周厉王三十三年(前846年),认为周王和晋侯在兖地分行,夙夷即夙沙之夷,夙夷居地在今山东省南部济宁与胶东交界处,郛城实指东郛,淖列为地名或地貌,当指低湿多泥之地,此地应在郛城附近,淖夷指居住在淖列之地的夙夷<sup>[211]</sup>。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为晋侯苏钟铭文二月干支有误,取“癸卯”改为“辛卯”说,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为厉王三十三年,由此确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sup>[212]</sup>。倪德卫、夏含夷认为晋侯苏钟铭文所载“三十三年”年代必指宣王在位年,即公元前795年,可是历法记载合于公元前794年,支持四分月相说<sup>[213]</sup>。许杰认为M64早于M8,“则似乎可从一个侧面支持宣王说”<sup>[214]</sup>。王占奎认为晋侯苏钟所记三十三年应是共和以来的第三十三年,共和十四年不是周室没有天子,此时的天子正是宣王,簋铭“伯和父”即史载共伯和,“王元年”只能是所谓的共和元年,即宣王元年,并从古音的角度论证了“对”与“司徒”的关系<sup>[215]</sup>。彭裕商认为晋侯苏钟和同墓所出簋壶等都应为宣王时物<sup>[216]</sup>。谭德睿认为编钟按音列成编的设计,是在春秋晚期或之前一些时期,在此之前为使青铜钟成编,采用的

是在已经铸造成的钟之中挑选成编的方法实现的,晋侯苏钟即是如此<sup>[217]</sup>。关晓武、廉海萍、白荣金、刘绪和华觉明等认为晋侯苏钟可能是使用陨铁刀具、高锡、超高锡青铜刀具和钢质刀具刻镂而成<sup>[218]</sup>。汤锡文认为修改铭文的做法,以适合自己的解释,这样做好比削足适履一样不可取。晋侯苏钟的铭文是没有错误的,至少当时的人是能够解释铭文的正确含义,我们所不能解释的,只能说我们的认识尚不够,姑且以疑存疑为好。《史记》所载为实,则晋侯苏是晋献侯无疑。所以,宣王三十三年说基本上可以排除了,晋侯苏钟所指的王,即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是厉王三十三年。铭文系一次性镌刻而成,镌刻时间在晋献侯即位之后,晋侯苏以王臣(祖孙三人同朝为官)或晋侯长孙的身份参加了战争,铭文记载的是晋献侯在周厉王三十三年参加了东伐战争的事迹,铭文系在位后追加的,周厉王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进行了东征南伐,苏钟采用的是重要事件纪年法,东伐战争发生在厉王三十三年,从铭文月相的解释来看,符合四分月相说,西周早期文字记录采用了月相定点,后来随着历法的深入人心,铭文大多采用了省略的记叙方法,演变为后来的四分说。西周当时并没有采用固定建子说,实际上,晋侯苏钟所记的建制为建寅,因为基于观像授时,月朔干支纪日的安排与实际天象上会有一到两天的差异<sup>[219]</sup>。李伯谦认为晋侯苏钟铭文中的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王,指的是与晋献侯同时的周宣王<sup>[220]</sup>。张培瑜认为如果在我们的纪年铜器合历研究中,出现历日不合的情况,首先应该检查的是自己的体系,最好不要过多地考虑金文中可能是错字或错误纪时的问题,尤其不要轻易改字,即使明显的错误,甚至于晋侯苏钟的既望、既死霸等等,最好也仍其旧,因为我们的认识有限,也许会随着考古材料的新发现认识会有所提高<sup>[221]</sup>。李伯谦认为将苏钟铭文中的“唯王三十又三年”解释为晋侯苏追记所刻厉王纪年的理由并不充分,它还应该是时王宣王的纪年,铭文中所记王的活动还应该是时王即宣王在世时的活动<sup>[222]</sup>。程平山认为“学者争论‘晋侯苏’钟时代及其刻写的时代,依据簋字写法应是较晚刻写的,出于晋文侯墓(M8),应是幽王元年至平王二十四年之间刻写的”<sup>[223]</sup>。王晖认为晋侯苏钟所记郛城之战交战地点在今河南中南部的“南国”钧台一带,“东国”是指东都洛阳,泛指指南国为江汉及淮河流域一带,从狭义看,南国的中心之地应在今河南许昌、禹县一带<sup>[224]</sup>。徐伯鸿认为晋侯苏钟所记“唯王

三十又三年”时在共和十二年,当晋釐侯十一年,即公元前830年<sup>[225]</sup>。韩炳华认为晋侯苏钟的刻凿年代以及埋葬年代均应在宣王时期,而铸造年代却应该在穆王时期,据此推断西周晚期的历法是比较成熟的<sup>[226]</sup>。

李朝远认为一堵为8钟应该是当时礼制的一般规范,M8、M93的两组编钟均为一肆的组合,M64的8枚楚公逆钟或许是两堵中的一堵<sup>[227]</sup>。黄锡全、于炳文认为楚公逆钟器主为熊鄂,讨论了铭文和此套钟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鎛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铭文最长的楚国铜器和成组乐器<sup>[228]</sup>。李学勤讨论了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的出土地和出土及进献时间,并将古今发现的楚公逆钟进行了比较,认为其形制近似,并对宋代钟的铭文予以释读,同意楚公逆为熊鄂的意见,认为楚公逆编钟出在晋穆侯墓内,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也同意楚公家为熊鄂子熊仪的意见,指出此时楚已自称大邦,却仍保留着“祀首”,令人联想到猎头的习俗,并推测楚公逆钟记载的铜料来源于大冶铜绿山<sup>[229]</sup>。刘彬徽认为楚公逆钟的发现提供了重新估价西周时期楚国发展水平的最新重要史料,提供了了解楚国与中原文化及周围方国部族文化关系的新史料,改变了过去认为楚国青铜器到春秋中期以后才形成自身特色的认识,有助于订正宋代发现的楚公逆钟的错误记载和看法<sup>[230]</sup>。李伯谦认为楚公逆钟的出土将晋楚两个大国的关系史往前推进了二百多年<sup>[231]</sup>。高至喜认为M64号墓出土的楚公逆编钟的周文化因素少,而楚文化因素多,而楚公家钟则相反,订后者年代在厉王时期,楚公家即楚熊挚,而不是熊仪<sup>[232]</sup>。美国柯鹤立认为楚公逆钟落葬时间在公元前785年,楚公逆可能为纪念四方之战大获全胜请人铸钟庆贺,认为孙诒让推断逆即熊鄂是有道理的,楚公逆钟铸造于南方地区<sup>[233]</sup>。陈剑认为楚公逆钟铭文中的“求”后一字为“人”字,读为“楚公逆出求人,用祀四方首”,李学勤释该字为“厥”非是<sup>[234]</sup>。董珊认为楚公逆钟铭文所记,很可能是为了获得祭祀人牲而专门发动的一场掠夺人口的战争,“夫工”即“敷供”,为“遍祭”之意,“四方首”是四方的主神,是四方神和社稷之神的集体称谓,蕴含了“五行之官”以及晚期所称五行配四方的思想观念<sup>[235]</sup>。

### 3. 晋侯墓地青铜器叔矢方鼎、杨姑壶的研究

关于叔矢方鼎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西周初年仍和商代一样流行年终置闰,其历法水平不比商代晚期进步多少,叔矢即为叔虞,此鼎可称为叔虞方鼎,

是迄今所知唯一一件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的铜器<sup>[236]</sup>。李学勤对叔矢方鼎的铭文进行了补释<sup>[237]</sup>。饶宗颐认为李伯谦论证详密,诚属创见<sup>[238]</sup>,但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认为,很难把叔矢说成唐叔虞<sup>[239]</sup>。王占奎支持李伯谦说,认为矢可释为虞,叔矢即叔虞<sup>[240]</sup>。吴振武认为将“矢”字等同于“吴(虞)”在目前仍无坚实的证据<sup>[241]</sup>。关于叔矢鼎中的“十四月”,饶宗颐、刘雨、王占奎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sup>[242]</sup>。黄盛璋认为叔矢不是唐叔虞,而是叔虞子燮父,一名一字<sup>[243]</sup>。早在1983年黄盛璋认为矢非吴、虞,字形、音、义不同<sup>[244]</sup>。张懋镠和田建文对叔矢释为唐叔虞持怀疑的态度<sup>[245]</sup>,张懋镠认为似乎叔矢的身份仅为一个朝臣,反映不出一国封君的情愫<sup>[246]</sup>。黄盛璋强调论证叔矢不是叔虞,而是其子燮父未即位前的名字,揭示了叔矢鼎的重要价值,认为叔矢方鼎作于成王后期,当时叔矢入侍成王而为厥士之一,厥士是王官官职<sup>[247]</sup>。黄锡全同意叔矢为唐叔虞的意见,并对铭文和断句进行了补充论证<sup>[248]</sup>。李学勤认为叔矢即叔虞,矢应是虞的本字,所以叔矢方鼎的主人应该就是唐叔虞<sup>[249]</sup>。沈长云认为叔矢之矢应释读为天,同意作器者为唐叔虞<sup>[250]</sup>。冯时认为叔矢之叔乃行字,后世以字为氏而称晋叔,叔虞之名本作矢,并讨论了叔虞名与字子于的关系,叔虞的身份属于王士,结合同墓所出晋侯尊铭文分析,认为叔矢即叔虞<sup>[251]</sup>。刘雨认为李伯谦分析的叔矢即唐叔虞是有道理的,指出铭文十四月的发现反映了西周时期人们对历法的认识水平,西周历法的研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薄弱环节,推测叔虞方鼎铭文可能记录了成王册命叔虞的大礼<sup>[252]</sup>。曹玮认为李伯谦释叔矢方鼎记载的三个祭名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这是三种可以单独完成的祭祀形式,在时间上有先后次序,内容上有紧密联系,铭文中的祭祀礼与殷商甲骨文的关系十分明显<sup>[253]</sup>。唐友波认为叔矢为叔虞应该是对的,并讨论了名字关系<sup>[254]</sup>。刘钊认为李伯谦指出的铭文中的叔矢就是晋国始封之君唐叔虞的意见绝对是正确的<sup>[255]</sup>。

关于杨姑壶,李学勤认为M63的杨姑应是晋穆侯的一位夫人,晋穆侯时杨国是姞姓,与普通婚M8为晋献侯墓,M64为晋穆侯墓<sup>[256]</sup>。第四次发掘简报认为晋侯邦父次夫人名杨姑,杨国(杨姑母家)铜器亦属首次发现<sup>[257]</sup>。王光尧认为杨乃杨国号本字,杨姑壶是媵器,认为是杨国国君之女嫁给晋侯邦父为妻者,杨国为姞姓诸侯,杨国地在今洪洞县东南十五里许,灭国的下限在晋献公十七年(公元前660年)<sup>[258]</sup>。王人聪认为此壶非媵器,而是已嫁妇女自作之器,杨

姑非杨国之女,而是嫁给杨国的姑姓之女,杨国为姬姓而非姑姓,认为它是杨国之器,是姑姓女子嫁于杨国后在杨国所作之器,它是晋人所获的战利品之一,被作为M63的随葬品置入墓中,杨姑不是M63的墓主<sup>[259]</sup>。张崇宁认为杨国被封于幽王时,晋武公和周景王封杨说均不能成立,杨国被灭在晋国武、献时期,64号墓主为晋鄂侯<sup>[260]</sup>。孙庆伟认为是周宣王而非幽王封尚父于杨,在此之前也没有一个姑姓的杨国,杨姑应是嫁到杨国的姑姓之女,当来自南燕或偃国,M63的墓主不是杨姑<sup>[261]</sup>。谢尧亭赞成王人聪说<sup>[262]</sup>。李伯谦综合周代彝铭材料,将妇女的称谓大体分为六类,认为杨姑壶的时代要早于文献记载的姬姓杨国的始封年代,坊堆—永凝堡遗址很可能是从西周早期开始的杨国,至两周之际被灭,宣王之子或后裔复封此地,但仍袭用了杨国的国号,此古国即姑姓杨国,文章中披露晋侯墓地除晋穆侯次夫人墓中出有杨姑壶,在晋靖侯夫人墓中(今按指M92)尚出有姑姓女子自作之盨。认为将杨姑壶铭的杨姑解释为姑姓杨国女子的自称似较将其视为嫁于杨国的姑姓女子的称谓更为合乎情理<sup>[263]</sup>。张德光认为杨姑壶是宣王晚期姑姓杨国女子嫁于晋国国君穆侯为妻之后的自作用器,M63的墓主人就是晋穆侯弗生之妻,杨国很可能在今洪洞坊堆—永凝堡一带,杨国姓姑,自西周初年至两周之际灭亡,周幽王八年宣王之子尚父或后裔复封此地,仍袭用了杨国的国号,但此杨姓姬而非姑,可能姬杨之地望仍在坊堆—永凝堡一带<sup>[264]</sup>。徐伯鸿认为杨姑是杨国姑姓之女<sup>[265]</sup>。

评:1.晋侯墓地用鼎是符合周礼的,也符合其爵位,何休的注或者并非西周古礼具体情形的真实反映。2.所谓的列鼎制的出现并不能说明用鼎制度的成熟,只能说明用鼎制度的变革,在列鼎制出现之前,用鼎制度早已存在,并广泛应用。若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我们对当时用鼎制度的认识不足,而不是用鼎制度本身有问题。3.西周墓地的用器制度体现了当时宗法关系和君臣关系的礼俗要求,正如徐伯鸿所说存在亲属关系政治化的过程。4.器用制度方面的研究涉及面广,比较深入,但有些论证流于形式,没有扎实的资料依据,新见不新。5.关于古代历法从来争议很大,应该承认我们对古代历法的认识非常有限,如对“初吉”等术语的讨论即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应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学习、总结、继承和发展,轻易否定器铭或文献记载以弥缝自己观点的作法实不

足取,张培瑜所言极是。

#### 四、西周公墓及其墓地制度问题

刘绪和罗新总结认为就墓葬规模而言,从早到晚愈来愈大,墓室长宽比例由大到小,墓室深度南排较北排略浅。墓道与墓室由等宽到墓室宽于墓道,属夫妇异穴合葬墓,此处墓地为晋侯专有,即为“公墓”,晋侯以下等级的贵族和国人当另有墓地<sup>[266]</sup>。卢连成认为在墓区的南部和北部发现的壕沟有可能是公侯墓地的围沟,这种围沟可能是陵园兆域区划的重要标志。东区6代晋侯大墓的坑位可能仍然遵循着西周昭穆排列的礼制。晋侯及其夫人实行异穴合葬制度,夫妻异穴合葬在西周时期已成为一种定制。晋国与卫国、燕国虽都为外服诸侯中的重要封国,但爵位等次可能稍逊于燕、卫之国,晋国诸侯在墓葬规格、礼乐器数量、组合以及车马舆服设置诸方面似乎也稍逊一筹,晋国的发展强大是在东周初年晋文侯之后了<sup>[267]</sup>。秋山进午认为,晋侯墓地至迟在西周中期开始独立,这和当时晋侯权力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夫妇异穴合葬墓是晋侯墓地的特点之一,在九·十三墓组中,夫人墓占优势,其形成的原因有可能跟从周王室下嫁的夫人地位较高有关。《周礼》所记“公墓”和“邦墓”之制,只是战国时代或其以后的现象,而不能上溯至西周时期。所谓的“昭穆制”亦同样很难理解为西周时期通行的制度<sup>[268]</sup>。李伯谦认为晋侯墓地即是迄今所知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诸侯国国君的公墓区了,并依据文献和考古实例提出当时家人选择墓地的三条原则,即公墓区与邦墓区不得相混(都城)北方和东方是通行方位,依山面水的高平之地是重要条件。同时提出晋国公墓制度与其他诸国的区别表明,晋国在挣脱当时牢牢束缚着社会机体的血缘关系纽带方面较其他国家前进了一步。并提出从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在晋国公墓区内并未实行昭穆制度,进而对《周礼·春官宗伯·冢人》所说的这种公墓墓位安排制度在西周时期是否真的存在表示怀疑。并指出夫妇并穴合葬墓的男女墓位的特点和M91、M92头向的特殊性。认为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发现不仅证明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而且证明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墓主举行的活动。并提出西周没有墓上建筑,推断商代也不会有墓上建筑<sup>[269]</sup>。谢尧亭总结认为晋侯墓地墓主埋葬时有殉葬现象,埋葬后有祭祀现象,祭祀坑自M8组以后大量出现,牺牲多为马,个别为牛,有用人陪葬和用人作牺牲的现象存在<sup>[270]</sup>。赵化成认

为北赵晋侯墓地所在及其周围地势较为平坦,墓地周围没有发现环壕或是其他标志墓地范围的建筑设施。国君与夫人并穴合葬是其特点<sup>[271]</sup>。印群认为公墓的规格是相当高的,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应葬有公室及其以上的贵族,没有贵族身份的人无资格葬入公墓,邦墓即是万民之墓地,即王室以外的国民墓地,邦墓只接受那些没有显赫贵族身份的一般社会成员。认为北赵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宝鸡强国墓地是公墓,而张家坡西周墓地、曲阜鲁故城西周墓乙组为邦墓<sup>[272]</sup>。高智群认为M6、M7组夫妇墓位固定为男左女右,应是周人“尚左”习俗在墓葬制度上的反映,已发现的商周公墓的墓位是依照一定的礼制进行安排的,但尚未有确凿证据证实存在礼书所谓的“昭穆”格局。殉葬的犬马主要供冥居守卫攘邪和墓主巡游出行之用。小型墓坑成年男女是服侍晋君夫妇于地下的殉葬者,身份有高低之分。牛羊作为祭品,贡献的对象应包括墓主和地祇,它和后世祭墓之礼性质有别<sup>[273]</sup>。李伯谦强调了曲村北墓地为晋国邦墓区,北赵南之墓地为公墓区,指出了晋国公墓区和邦墓区的特点,同时指出北赵墓地为晋国大夫墓地的认识无法成立。并认为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体现不出昭穆制度,横置S形的墓序反映了何种墓位安排尚待研究<sup>[274]</sup>。刘绪、徐天进指出晋国墓地未见实行昭穆制度,夫妇异穴并列墓主要见于大中型墓,在西周中小型墓中极为少见。墓向的一致和墓主规模逐渐增大的趋势显现出当时有夫妇墓室等差和相关“度数”的规定,凡有车马坑的,一定是随葬3鼎或2鼎的男性墓主,且车马坑均位于主墓之东,墓内葬车与否、多少和大小因男女而各异,殉人的现象见于西周早期,殉狗的现象见于西周早中期的男性墓<sup>[275]</sup>。宋建认为晋侯的墓葬都集中埋葬在同一墓地,晋侯墓地的兆域可能经过了不只一次的规划,晋侯墓地不葬晋国的其他高层贵族。以车马坑陪葬是晋侯墓地的重要特征。M93组明显同其他8组墓葬间隔。晋侯墓并未按昭穆形式排列。周代诸侯的墓地规划并没有整齐划一的形式<sup>[276]</sup>。谢尧亭怀疑晋侯墓地外围应有兆沟<sup>[277]</sup>。乔斌、田双印认为从西周中期到春秋初年的晋侯墓地内并未实行昭穆之制<sup>[278]</sup>。王恩田认为晋侯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多不属于夫妻合葬墓<sup>[279]</sup>。宋玲平认为晋侯墓地的内涵和排列方式与《周礼》所说的“公墓”不尽相符,但其凸显晋侯及其夫人特殊政治地位的意图仍然非常明确,应属“公墓”或“集中公墓”。父子相继的历代晋侯及

其夫人同葬于公墓,这种安排方式显然是刻意所为,旨在强调嫡系血缘关系,突出“大宗”的特殊地位。墓道一直是晋国国君享有的特权<sup>[280]</sup>。

评:1.从西周墓地看,“公墓”和“邦墓”之制在西周时期确实存在,不过晋侯墓地的“公墓”形式在已发现的西周墓地中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2.晋侯墓地周围的壕沟是作者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工作能对其性质有更深入的了解。3.夫妇并穴合葬的现象在西周时期只见于较高等级的贵族,低级贵族和其他非贵族身份者一般不见使用,这是西周时期的一种礼制现象,反映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婚制和社会组织状况。4.有作者认为晋侯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多不属于夫妻合葬墓的说法多少让人难以理解。

## 五、晋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发展

侯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晋文化应是萌芽于西周晚期,形成于春秋早期而鼎盛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间,指出晋侯墓地和上郭墓地可以确指的文化因素除了宗周以外,还有唐尧、夏和北方戎羌三种,同时指出晋侯墓地无明显的殷商文化影响,证明此地并非商人的活动区<sup>[281]</sup>。张懋镠认为晋侯墓地全面展示了如何从殉人、殉犬到只殉犬不殉人以至连犬也不殉葬的这样一个演化发展过程。殉人现象在晋侯墓地的消失,是一部分保守、落后的殷商文化必然被摒弃而自然消退的结果。晋国西周早期后不再殉人的原因与周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关<sup>[282]</sup>。雍颖认为在西周中期以前,晋侯夫人的社会地位可能相对较高,西周中期晋侯夫人的地位有所降低,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她们的地位又有所提高,进而冲破了礼制的层层束缚,晋侯夫人在晋国颇受尊重<sup>[283]</sup>。张童心认为晋国由于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大熔炉,通过M113中三足瓮的分析,结合文献记载,论述了晋与戎狄的关系以及晋国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汇融合,创造出了辉煌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sup>[284]</sup>。张光裕通过对苏公匱的释读,探讨了西周晚期苏晋联姻,苏国可能依附晋国的历史事实<sup>[285]</sup>。李夏廷认为人兽复合纹广泛出现在西周时期至春秋初年的玉器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宗教习俗和观念形态<sup>[286]</sup>。

评:1.殷、周文化存在着差异,也存在联系,所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晋国早期早段墓葬对殷商文化葬俗的使用是出于何种原因?是“因其俗”还是其他,一时难以说清,后来为什么又摒弃之

而变为另一种葬俗?其间必然存在一次礼制的变革。2.男尊女卑是西周晋国社会的基调,妇女地位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在同一等级内而言男尊女卑,不同等级之间自然不是这样。晋侯夫人的地位仅仅低于晋侯,而相当于当时其他男性高级贵族。

晋侯墓地的材料十分丰富,可资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墓地的严重被盗至为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大面积布方整体揭露甚是遗憾,至今我们对各墓组之间内容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不过幸运的是,这批资料是由李伯谦先生主持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精美的报告,此乃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1] 本文涉及到的研究者较多,为行文方便,均直呼其名,省尊“先生”二字,请见谅。

[2][28][222] 李伯谦《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与晋侯墓地若干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

[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11月,第17页。

[4] 徐天进《晋侯墓地的发现和研究现状》,《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七期。又见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7月。

[5][9]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一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

[6] [9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8][25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9][21][4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10][44][148] 孙华《关于晋侯对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年第9期。

[11][45][178][267] 卢连成《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年代及墓主考订》,《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月。

[12] 曲沃县博物馆《天马一曲村遗址青铜器介绍》,《文物季刊》1996年第3期。

[13] 李伯谦《天马一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

[14] 黄锡全《关于晋侯墓地几位晋侯顺序的排列问题》,《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届毕业生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4月。

[15] 刘启益《晋侯邦父墓出土有铭铜器及相关问题》,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10月。

[16]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17] 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

[18] 朱凤翰《关于北赵晋侯诸墓年代与墓主人的探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

[19] 徐天进《西周至春秋初年晋国墓葬的编年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

[20] 杨建军《三晋东周铜器墓初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1年6月。

[22][6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

[23] [73][161] 朱凤翰《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24] [71][163][246][282] 张懋镠《晋侯墓地文化解读三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7月。

[25] [81] 孙庆伟《晋侯墓地M114年代与墓主的推定》,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6] [220] 李伯谦《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

[27] 王占奎《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年第6期。

[29] 程平山《西周时期晋侯世次与系年考》,《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

[30] [176][280] 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8月。

[31][48][150][196] 孙华《晋侯苏/斯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第8期。

[32] [206] 仇士华、张长寿《晋侯墓地M8的碳十四年

代测定和晋侯苏钟》《考古》1999年第5期。

[33] 同[3]第18页。

[34][65] 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月。

[35]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8月。

[36] 李朝远《晋侯X方座簋铭管见》,《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

[37] 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第1期。

[38] 张颢《晋侯X簋铭文初识》,《文物》1994年第1期。

[39] 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2期。

[40][101][103][266]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2] 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

[43] 李学勤《〈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9月。

[46] 李裕民《晋侯盂壶考》,《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月。

[47][188] 李学勤《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年第3期。

[49] 冯时《略论晋侯对与晋侯匹》,《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24日。

[50] 林圣杰《晋侯卣小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10月。

[51][269] 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52] 张长寿《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文物》1998年第1期。

[53] 李伯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

[54][106][198][262][270] 谢尧亭《北赵晋侯墓地初识》,《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

[55] 冯时《略论晋侯邦父及其名、字问题》,《文物》1998年第5期。

[56] 江林昌《天马—曲村遗址的年代学和文化学意义》,《文物天地》1998年第5期。

[57]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陕西

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

[58] 彭林《北赵晋侯墓群与昭穆墓位》,《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

[59] 刘克甫《北赵晋国墓地性质管见》(台北),《古今论衡》第五期,2000年。

[60] 倪德卫、夏含夷《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1] 梁云《“晋公宗室”考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八期,2001年3月。

[63] 孙庆伟《也辨“晋公宗室”——兼论晋侯墓地M114墓主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十期,2001年9月。

[64] 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月。

[66] 刘克甫《“北赵晋国墓地即晋侯墓”一说质疑》,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7] 张长寿《晋侯墓地的墓葬序列和晋侯铜器》,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8] 许杰《晋侯墓地中后排晋侯墓的早晚序列及其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69][281] 侯毅《从晋侯墓铜器看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0] 田建文、谢尧亭《问疑晋侯墓》,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2][243] 黄盛璋《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父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74] 张懋镠《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父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75] 王占奎《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父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76][111] 田建文《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父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77] 孙庆伟《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父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78][164][276] 宋建《晋侯墓地浅论》,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9][247] 黄盛璋《晋侯墓地M114与叔父方鼎主人、年代和墓葬世次年代排列新论证》,上海博物馆《晋侯墓

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0][248] 黄锡全《晋侯墓地诸位晋侯的排列及叔虞方鼎补正》,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2] 何琳仪《晋侯斲器考》,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3] 陈松长《“𠄎”字小考》,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4][169] 王世民《晋侯墓地编钟的再探讨》,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5][216] 彭裕商《晋侯苏年代浅议》,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6] 汪涛《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7] 李伯谦《晋侯墓地的新发现》,国家文物局主编《2001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88]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8 月。

[89][117][223] 程平山《北赵晋侯墓墓主考》,《夏商周历史与考古》,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6 月 1 版。

[90][118][166][225][265] 徐伯鸿《晋侯墓葬用鼎制度考——兼说晋侯墓地墓葬的排列顺序与墓葬的墓主》,载徐伯鸿博客 2007 年。

[91] 王恩田《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舍墓地族属》,《中国历史文物》2007 年第 4 期。

[92][146] 角道亮介《西周时代晋国墓地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第七号 2007 年 12 月。

[93] 刘华夏、刘克甫《“伯”、“仲”、“叔”、“季”与西周晋侯世系》,《考古》2008 年第 4 期。

[94] 李建生《曲沃羊舍墓地几个问题的思考》,《文物世界》2008 年第 3 期。

[95] 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 157~169 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96]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 年第 7 期。

[98] 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2 月 12 日。李伯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 4 月。

[100] 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 年第 1 期。

[102] 田建文《晋国早期都邑探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04] 邹衡《晋始封地考略》,吴荣曾主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105] 邹衡《晋国早期都成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及其学术意义》,《文物天地》1998 年第 1 期。

[107] 江林昌《晋侯墓地与夏墟、唐风、晋都》,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108] 陶正刚《晋国早期都城“唐”地考》,李元庆主编《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 6 月。

[109] 刘克甫《北赵晋国墓地性质管见》(台北)《古今论衡》第五期 2000 年。

[110] 陈继荣《晋国的始封和迁都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0 年 4 月。

[112][162][231][274] 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 年 7 月。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113] 饶宗颐《由古唐国谈唐叔虞封地与“叔仄”及“嬖父”问题》2002 年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14] 谢尧亭《〈左传〉·考古札记八则》,《文物世界》2003 年第 1 期。

[115] 王立新《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3 年第 1 期。

[116] 任伟《西周封国考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8 月。

[119] 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

[120] 孙庆伟《魏公簋、晋侯尊与叔虞居“鄂”、嬖父都“向”》,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 35 期 2007 年 12 月。

[121] 朱凤翰《魏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2007 年 3 期。李伯谦《魏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 33 期 2007 年 6 月。

[122] 吉琨璋等《山西曲沃羊舌村发掘又一处晋侯墓地》,《中国文物报》2006 年 9 月 29 日 2 版。吉琨璋《曲沃羊舌晋侯墓地 1 号墓墓主初论》,《中国文物报》2006 年 9 月 29 日 7 版。马冰《也谈曲沃羊舌 M1 和北赵晋侯墓地 M93 的墓主》,《中国文物报》2007 年 2 月 2 日 7 版。田建文《也谈曲沃羊舍墓地 1 号墓墓主》,《中国文物报》2007 年 3 月 30 日 7 版。吉琨璋《羊舍晋侯墓地》,《文物天地》2007 年 3 期。吉琨璋《再论羊舍晋侯墓地》,《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 34 期 2007 年 9 月。李建生《曲沃羊舍墓地几个问题的思考》,《文物世界》2008 年第 3 期。

[123] 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 年第 4 期。

[124] 朱启新《不见文献记载的史实——记上海博物

馆抢救回归的晋国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日。

[125] 李学勤《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5期。

[126] 赵世刚《晋公戈的年代小议》,《华夏考古》1996年第2期。

[127] 周亚《馆藏晋侯青铜器概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9月。

[128] 孙华《晋公戈年代小议》,《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

[129] 张德光《晋国的青铜文化》,《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

[130] 陈芳妹《晋侯对辅——兼论铜辅的出现及其礼制意义》,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七卷第四期。

[131] 蔡鸿江《晋系青铜器研究》,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系博士论文(台湾)2000年(摘要)。

[132] 刘克甫《北赵晋国墓地性质管见》(台北)《古今论衡》第五期,2000年。

[133] 唐友波《晋侯墓群铜器“叔”氏及相关铭文杂议》,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34] 商彤流《从晋侯墓地M113出土的青铜双耳罐看晋文化与羌戎的关系》,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35] 汪涛《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36] 苏芳淑、李零《介绍一件有铭的“晋侯铜人”》,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37] 李学勤《晋侯铜人考证》,中国文物学会等《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

[138] 孙永和、吉琨璋《曲沃县博物馆藏晋侯墓地被盗文物介绍》,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39] 李朝远《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综览》,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4月。

[140] 末房由美子《晋侯墓地所出青铜容器的立体装饰(提要)》,曹峰译,2002年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1] [165] 陈芳妹《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42] 周亚《晋韦父盘与盘盂组合的相关问题》,《文物》2004年2期。

[143] 李晓峰《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144] 杨颖亮《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9月30日。

[145] 陈剑《晋侯墓铜器识小二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六期,2005年9月。

[147] 李学勤《文王玉环考》,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一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

[149] 孙庆伟《两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

[151] 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文物》1998年第4期。

[152] 赵化成《周代棺槨多重制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153] 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154] 印群《论周代列鼎制度的嬗变——质疑“春秋礼制崩坏说”》,《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55] 宋玲平《晋侯墓地玉器的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艺术》,《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6月。

[156] 李伯谦《晋穆侯夫人随葬玉器反映的西周后期用玉观念的变化》,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2000年8月。

[157] 曹楠《试论晋侯墓地出土的葬玉》,《考古》2001年第4期。

[158] 张尉《西周琢玉的光彩篇章》,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

[159] 孙庆伟《周代墓葬所见用玉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5月。

[160] 孟耀虎、任志录《晋侯墓地出土原始青瓷》,《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

[167] [283] 雍颖《晋侯夫妇墓之比较及晋国高级贵族妇女社会地位试析》,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68] 张奎《对晋侯邦父与夫人墓使用随葬品制度的一点看法》,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0] 李朝远《晋侯青铜鼎探识》,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1] 周亚《关于晋侯苏鼎件数的探讨》,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2] 张崇宁《肖形青铜器的启示》,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3] 马今洪《鸟尊、猪尊、兔尊二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4] 陶正刚《晋国鸟纹的再研究——论晋国祖先始祖鸟》,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5] 杨晓能《从北赵晋侯墓地 M 113 出土铜卣谈商周青铜礼器外底的动物图像》,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77] 朱启新《不见文献记载的史实——记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晋国青铜器》,《中国文物报》1994 年 1 月 2 日。

[179] 王占奎《周宣王纪年与晋献侯墓考辨》,《中国文物报》1996 年 7 月 7 日。

[180] 王恩田《晋侯苏钟与周宣王东征伐鲁——兼说周、晋纪年》,《中国文物报》1996 年 9 月 8 日。

[181] 马承源《晋侯苏编钟》,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7 期,1996 年 9 月。又载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82] 王占奎《金文初吉等四个记时术语的阐释与西周年代问题初探—— $(4 \times 9) \times 10 + 5 = 365$  假说》,《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5 期。

[183] 李学勤《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中国文物报》1996 年 12 月 1 日。

[184] 王占奎《晋侯苏编钟年代初探》,《中国文物报》1996 年 12 月 22 日。

[185] 李伯谦《晋侯苏钟的年代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 年 3 月 9 日。

[186] 刘启益《晋侯苏编钟是宣王时铜器》,《中国文物报》1997 年 3 月 9 日。

[187] 王世民《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 年第 3 期。

[189] 陈久金《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 年第 3 期。

[190] 张闻玉《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 年第 3 期。

[191] 张培瑜《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 年第 3 期。

[192] 高至喜《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 年第 3 期。

[193] 裘锡圭《晋侯苏钟笔谈》,《文物》1997 年第 3 期。

[194] 黄锡全《晋侯苏编钟几处地名试探》,《江汉考古》1997 年第 4 期。

[195] 冯时《晋侯苏钟与西周历法》,《考古学报》1997 年第 4 期。

[197] 黄彰健《释〈武成〉月相、金文月相、并论〈晋侯苏编钟〉及武王伐纣年》(上下),《大陆杂志》第 96 卷第 4 期、第 5 期。

[199] 黄盛璋《晋侯苏钟重大价值与难拔钉钉子指迷与解难》,《文博》1998 年第 4 期。

[200] 周书灿《晋侯苏编钟的作战地点与行军路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第 4 期。

[201] 王子初《晋侯苏钟的音乐学研究》,《文物》1998 年第 5 期。

[202] 方述鑫《谈谈晋侯苏钟历日的有关问题》,四川

联合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 年 10 月。

[203] 李朝远《晋侯苏钟铭文的刻制与西周用铁问题》,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204] 常金仓《晋侯苏钟铭的月相年代问题》,《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205] 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 5 月。

[207] 江林昌《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研讨会纪要》,《文物》1999 年第 6 期。

[208] 黄盛璋《晋侯苏墓与晋侯苏钟绝对年代辨证》,《中国文物报》1999 年 9 月 22 日。

[209] [211] 李仲操《谈晋侯苏钟所记地望及其年代》,《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3 期。

[210] 成家徽郎《晋侯苏编钟铭文的确切年代》,《中国文物报》2000 年 1 月 12 日。

[212] 同[3] 第 23 页。

[213] 倪德卫、夏含夷《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214] 许杰《晋侯墓地中南排晋侯墓的早晚序列及其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5] 王占奎《再谈共和纪年问题——附论僖侯对与司徒的关系》,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7] 谭德睿《编钟设计探源——晋侯苏钟考察浅识》,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8] 关晓武、廉海萍、白荣金、刘绪、华觉明《晋侯苏钟刻铭成因试探》,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19] 汤锡文《晋侯苏钟铭文再认识——兼小论商周历法》2002 年网络文章。

[221] 张培瑜《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 年第 6 期。

[224] 王晖《晋侯苏钟铭郢城之战地理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21 卷第 3 辑,2006 年 7 月。

[226] 韩炳华《从晋侯苏钟的断代看西周金文月相词语》,《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227] 李朝远《从新出青铜钟再议“堵”与“肆”》,《中国文物报》1994 年 9 月 14 日。

[228] 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考古》1995 年第 2 期。

[229] 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 年第 2 期。

[230] 刘彬徽《楚金文和竹简的新发现与研究》,《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232] 高至喜《晋侯墓出土楚公逆编钟的几个问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33] 柯鹤立《试论晋侯邦父墓中的楚公逆编钟》,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7月。

[234] 陈剑《晋侯墓铜器识小二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六期,2005年9月。

[235] 董珊《晋侯墓出土楚公逆钟铭文新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六期,2005年9月。

[236] 李伯谦《叔矢方鼎铭文考释》,《文物》2001年第8期。

[237] 李学勤《谈叔虞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

[238] 饶宗颐《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 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239] 饶宗颐《由古唐国谈唐叔虞封地与‘叔矢’及‘嬖父’问题》,2002年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40] 王占奎《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 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241] 吴振武《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 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242] 饶宗颐、刘雨、王占奎《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 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244] 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245] 张懋镠、田建文《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 114 出土叔矢方鼎及相关问题研究笔谈》,《文物》2002年第5期。

[249] 李学勤《叔虞方鼎试证》,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0] 沈长云《新出叔天方鼎中天字的释读问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1] 冯时《叔矢考》,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2] 刘雨《叔虞方鼎铭的闰月与祭礼》,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3] 曹玮《叔矢方鼎铭文中的祭祀礼》,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4] 唐友波《晋侯墓群铜器“叔”氏及相关铭文杂议》,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55] 刘钊《叔天方鼎铭文管见》,《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6月。

[256] 李学勤《晋侯邦父与杨姑》,《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

[258] 王光尧《从新出之杨姑壶看杨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2期。

[259] 王人聪《杨姑壶铭释读与北赵 63 号墓主问题》,《文物》1996年第5期。

[260] 张崇宁《从杨姑壶试探杨国的问题》,《中国文物报》1996年10月13日。

[261] 孙庆伟《试论杨国与杨姑》,《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263] 李伯谦《也谈杨姑壶铭文的释读》,《文物》1998年第2期。

[264] 张德光《亦从杨姑壶铭试探杨国的变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

[268] 秋山进午《晋侯墓地的发掘といくつかの問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六号,1996年11月16日,东京。

[271]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摘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五期,2000年6月。

[272] 印群《西周墓地制度之管窥》,《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8卷第4期,2000年7月。

[273] 高智群《从晋侯墓地论商周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史林》2002年第1期。

[275] 刘绪、徐天进《关于天马一曲村遗址晋国墓葬的几个问题》,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77] 谢尧亭《围墓沟初探》,《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

[278] 乔斌、田双印《从虢国墓地谈西周时期丧葬特点与社会关系》,《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8日。

[279] 王恩田《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舍墓地族属》,《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

[284] 张童心《晋与戎狄——由 M 113 出土的青铜三足瓮所想到的》,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85] 张光裕《新见苏公作晋妃匜侧记》,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86] 李夏廷《浅析晋侯墓地出土的人兽复合纹玉器》,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